

清秋子 著

國士



—— 牟宜之傳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013044274

K827
1770

八子
著

國 士



K827
1770



北航 C1651995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士：牟宜之传 / 清秋子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5

ISBN 978-7-5133-1160-1

I. ①国… II. ①清… III. ①牟宜之 (1909 ~ 1975) —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0029 号

国士：牟宜之传

清秋子 著

策划编辑：刘丽华

责任编辑：陈卓

责任印制：韦舰

装帧设计：@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720mm × 1000mm 1/16

印张：26.75

字数：270千字

版次：2013年5月第一版 2013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1160-1

定价：4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國士年宜之傳

九十六雙

李銳



天道无邪不容欺，
评说还须待后年。

——牟宜之

序一

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

李锐

五年前我写过《读牟宜之诗——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文，听说诗集很快售完。文中关于作者，未能作详细介绍。现在长于历史传记的作家清秋子为牟宜之作了传记，传名《国土》。牟宜之的儿子牟广丰让我作序，虽然传记只是匆匆一读，但由于传记主人同自己有许多相似的经历，仍乐意为之。

何谓“国土”？用太史公司马迁的话说：“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牟宜之长我8岁，1925年读中学时就加入共青团。在上世纪前半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人群中，他有一种特殊的代表性，这同他的姨夫丁惟汾有很大关系。

丁惟汾与我的父亲同时代，同于1905年到日本留学时即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同时当选国会众议员。父亲在日本时，同黄兴、宋教仁、秋瑾是好朋友；辛亥革命回到湖南，就同谭延闿一起努力推行宪政；当年与平江同乡共产党的前辈方维夏、李六如也是好朋友；张勋复辟解散国会后，父亲还到广东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不幸的是，1922年他不到四十岁就去世了。

在民初革命史上，丁惟汾很受孙中山器重，曾多次委以重任，同盟会创建之初，便被推为山东省主盟人；民国初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山东省党部支部长；袁世凯称帝时，在山东起兵反袁；共谋北伐时，与廖仲恺并称为孙中山的“左右之臂”；1924年，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一大上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忠实执行孙中山发起的国共合作，与李大钊等密切往来；李大钊等不幸遇难时，丁因外出办事幸免于难；国民党执政时期，丁历任要职，但始终同中共保持

友好关系。

牟宜之很幸运，有丁惟汾这样的一个好姨夫，才使他很年轻时即沐浴大革命的雨露，转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1924年，为工作方便计，丁惟汾举家迁徙济南，牟宜之也就跟随到济南读书，与他同住一室的是丁惟汾的侄子丁君羊，曾任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君羊早年丧父，被丁惟汾收养，视如己出，从小就受辛亥革命影响，思想激进，喜读进步书籍，进而信仰共产主义。牟宜之就是在这位表兄的影响下，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飞跃，从而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并且和党内的上层人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蒋介石发动政变，镇压共产党后，山东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牟宜之由此失去组织关系。1932年，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中共日照中心县委组织日照暴动。为了搞到枪支弹药，牟宜之卖掉妻子陪嫁的30亩地，购得枪弹。暴动失败后，牟宜之被通缉，只身逃到上海，躲进姨夫家中，转而留学日本。1935年回国后，经丁惟汾和邵力子的推荐，在南京的中央政治会议任外事组专门委员。据他生前自述：“西安事变后我到南京游说各要人，力倡不要进攻西安，要和平解决，联共抗日。当蒙一班国民党元老所称许，对西安事变解决或有帮助。”不论作用大小，由于丁惟汾的关系，他在国民党中也有了不少人脉因缘，为他日后做敌工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牟宜之利用在南京的关系，筹款筹枪，在山东组织抗日武装。期间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过董必武，要求解决入党问题，被告知留在党外工作更有利。山东的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被枪毙后，牟宜之利用姨夫的关系获得乐陵县县长一职。在这个土匪武装林立的“三不管”县，他大显身手，一方面想方设法为中共的抗日部队提供帮助，另一方面积极争取虽然反共却打着抗日旗帜的土匪武装共同抗日；同时组建了县公安大队维持治安，并同中共联手剿灭为祸百姓的土匪武装，其艰难复杂的程度可想而知，至今被乐陵老一辈人称之为“乐陵版的《三国演义》”、“乐陵版的《七侠五义》”。1938年，牟宜之终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不久，调任八路军挺进纵队司令部秘书长，负责日常统战工作。后部队改编，出任泰山支队司令。他还化装成商人，不远万里，辗转敌后，到当时陪都重庆，协助周恩来做统战工作，还去延安会见毛泽东，作过长谈。然后再经西安、太行回冀鲁豫，曾同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会谈过，并用自己的几万元积蓄，解决了八路军的衣物困难。回到山东后，担任过滨海区副参议长、沂蒙专区专员、115师参事室主任、山东军区新编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

长等职，曾策反多股敌伪军起义。抗战胜利后，在军调部执行处参与国共谈判。解放战争时期，调辽东军区，先后任秘书长、联络部长、敌工部长等职，曾策动国民党军184师起义，创建功勋。

1949年共产党执政之后，牟宜之先后在林业部、建设部任职，“职务越来越低”，逐渐被边缘化。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双跨”，同国民党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丁惟汾已辗转去了台湾，被划入国民党右派阵营；胞弟牟乃紘是蒋经国的下属，在台湾任国防部少将专员。尽管如此，牟宜之还是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如在城市建设方面的超前性规划，揭露政治骗子李万铭等。揭露李万铭在当年是颇具影响的事件。

到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牟宜之再也躲不过去了。以他的身世，他的秉性，不让他秉直劝谏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被“阳谋”圈住，应声倒地，从此打入另册。“文革”开始后，又被发配到黑龙江劳动改造，饱尝种种苦难，直到去世不得还乡。但“国家不幸诗家幸”，牟宜之后期的诗歌创作达到一个高峰，尤其是“文革”以后，进入化境，直逼李杜。我在为《牟宜之诗》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已加论述。牟宜之是东林后人，幼年由祖父教导，从《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开蒙，入私塾后，始读《四书》，读过的书，他均可背诵。据说，他识字之多，更是罕有人比，只要是《康熙字典》上有的字，全能认识，被人称为“活字典”。丁惟汾是著名的训诂学家，对这位内侄的才学很是欣赏，曾有心让其承继自己的衣钵，专心国学。由于自幼的修养，牟宜之的才学特别显现在他的诗人气质中，我写过这样的评语：“其艺术性、人民性、正义性品位极高”，很欣赏他诗中所表现出的浩然正气、壮志豪情、乐观豁达，特别是极具前瞻性的预言式宣判。这本传记的作者对牟诗的品评，主要是就其“同步批判”的勇气和预见性加以论述，我很是赞同。可以举几个例证：

青少年时期的感时愤世：“苍生何罪同遭劫？此意茫茫欲问天。”战乱年代对军阀的控诉：“兵连祸结灾不单，去年潼关又大战。”抗战时对侵略的谴责和对未来的向往：“野戍荒郊闻鬼哭，阳光大道少人行。何年涤荡平胡虏，载戢干戈不用兵。”“学书学剑为报国，哪堪神州遭踏践”，这是他早年的立志。沦为“贱民”后，他意念坚定，不改初衷：“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身世情怀谁能解，先忧后乐思范公”。“文革”期间，发配到边陲绝域，身心备受摧残的同时，在坚强意志的支撑下，精神更得升华，思想更加深刻，人不堪其消瘦，诗陡增其壮美，其“同步批判”的力度日益增大，彰显出超凡的洞察力

和预见性。如他在《冬日》中所言：

索居白日且晦暝，瀚海阑干百丈冰。
窗外时闻山魃语，林间常有木魅行。
静观绝域幽奇趣，厌作离歌哀怨声。
步上平沙一极目，天荒地老亦多情。

得知彭老总二次受辱，他感同身受，写下《闻彭大将军被辱有感》：

一生忧国复忧民，白发斑斑老谏臣。
安邦无畏平胡虏，济世有策犯龙鳞。
夙慕忠贞常自励，只缘同病更相亲。
苍狗白云任变幻，不愧东西北人。

他对“文革”乱局的是非颠倒，豺狼当道，人心不古，世风险恶，抨击无已，诗句极多，如“新贵多显赫，贪佞塞庙堂。傍行狐与兔，共事豺与狼。常怀临渊意，小心辟祸殃。”“雪中送炭世罕有，井下投石所见频”。1971年林彪事发，特写下咏史诗三首，被学者赞为当年评议此事旧诗词中的“翘楚”。不仅道出“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的社会真情，还作出“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的历史宣判。本书作者为此评价传主的诗篇：“当年发出这种‘历史的先声’的人，不是尚存的民国名流，不是学者教授，不是作家艺术家，亦不是叛逆青年，而是一位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

牟宜之是自古“国士”传统道德文化的英魂。他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的传记亦是值得传播的。

2013年2月23日

序二

为国纾难 为士招魂

钟沛璋

作家清秋子为诗人牟宜之作传，取名“国土”，我深以为然。

什么是“国土”？太史公司马迁如是说：“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而这些，牟宜之身体力行，皆兼备之。

先说“自守奇士”。牟宜之一生贯穿了大动荡、大变革的20世纪中国，与此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多有牵涉，与国共两党上层皆有非同寻常的交往，其经历跌宕起伏：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他“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战争年代，为民族解放，他“投笔从戎事国殇”，“冲锋在前奔而殿”；和平建设时期，他不求闻达，“埋名复隐姓，乐道又安贫”，为坚守信念，他“摧眉折腰非所能，秉性由来本傲岸”，“几经跌跤几碰头，不长一智徒经蹻”；晚年于艰窘困厄中，他豪情不减当年，“忽然闹天宫，忽然掘泥犁”，“雄兵百万一支笔，莫道廉颇已老矣”。这等人生，不可谓不神奇也。另一方面，牟宜之不论身处顺逆，始终表现出“富贵不淫贫贱乐，匹夫自有兴亡责”的中国传统士人风骨，他“不信鬼神不信命，一生傲岸一生贫”，这等意念，不可谓不坚守也。

再说“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就有更多的例证。牟宜之少年离家，投身革命，自是“忠孝不能两全”，且他那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与农村士绅阶层的父辈，已绝然不同，“孝”的意义首先是报效祖国与民族。但尽管如此，牟宜之在国事稍安时，仍能为其父母养老送终，尽到儿子的责任和义务。牟宜之一生坚持真理，秉持诚信，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绝

对拥护真理的人，我是纯真的人，我能为真理牺牲一切，这是有事实表现的。”他以国民党县长的身份，能够取得周恩来、罗荣桓、肖华等中共上层领导人的信任，靠的就是肝胆相照的诚信。他一生自奉甚俭，不取任何不义之财为自身谋利，将在国民政府任职期间积攒的数万大洋送给八路军129师，解决了部队的冬衣困难，这难道不是“临财廉，取予义”？为了真理与事业，对牟宜之来说，“和璧隋珠皆粪土，清歌妙舞不留连”。在牟宜之眼里，人无有上下之分。一方面，他“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另一方面，他又与刻字师傅、鞋匠等“引车卖浆者流”结为朋友，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发出“苍生若有济，何惜老年头”的浩叹。这些，已超越了“分别有让，恭俭下人”的境界。

至于“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更是牟宜之一以贯之、践行终身的本色。且不说他战争年代出生入死，“青年疆场运奇谋，独闯虎穴，智取敌酋”的超凡业绩，也不说他“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的英雄气概，就是和平建设时期和“反右”、“文革”中身遭谗陷，沦为贱民，他依旧心怀社稷，不改初衷，为祖国统一献计献策：“关怀百越犹烽火，殷盼九州早大同”；“愿将一滴玄黄血，化作甘霖洒大千”！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以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密切的社会关系和多年统战工作的经历，早在1974年就上书邓小平，系统地提出了对台工作“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

凡此等等，不胜枚举。为此，借用司马迁的话说：“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土之风。”

在这本传记里，作者对牟宜之所处时代，以及那一时代年轻人的思想倾向和政治选择多有阐述。对此，我也谈谈我的看法。

牟宜之长我15岁，是我的兄长，但我们皆身陷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疾风暴雨中。这一“变局”，始自1840年，至今仍在延续，且具有多重含义。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已不仅限于数千年来周而复始、改朝换代式的政权危机。更为深重的危机是，中国在世界列强的环伺觊觎下，存在着被蚕食、瓜分，将要亡国灭种的危险。另一方面，国门已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在西方文明映衬下，中国积贫积弱，政治腐败，政府无能，从而使包括所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遭遇到空前未有的挑战，这即是梁启超所说的“四千年大梦之唤醒”。总之一句话：传统的办法不行了，以前的路走不通了，中国向何处去？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几代志士仁人为救亡图存，上下求索；他们立党为

公，毁家纾难，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其间经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后又有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半个多世纪华夏大地上血沃荒原，尸横旷野，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牺牲，目的只有一个，即追求百姓的福祉、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进步。从这一意义讲，自清末以来，凡秉持上述目的，不论何党何派，信奉何种学说，坚持哪一主义，在源头上均为一家，国、共两党尤是。至于某党派日后发生的嬗变和历史错位，亦不能抹杀其立党初衷和历史贡献。对党派尚且要如此历史地看待，对那一时代的人更不应妄加非议。

那一时代有知识文化的年轻人，受传统文化熏陶，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外抗强敌，内拯民生，就像牟宜之诗里所言：“学书学剑为报国，哪堪神州遭踏践！”他们受西学浸染，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并独立作出自己的政治选择。我同牟宜之一样，年轻时选择了革命，选择了共产主义。回想当年的意气风发，正像牟宜之诗里所描述：“盛赞马列是圣哲，痛斥军阀为鸡狗。革命壮志气贯虹，豪情万丈胆如斗。”

尽管几代人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取的成功演变到今天，与我们当初的革命理想，在事实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背谬，但我并不为年轻时的选择而悔怨。历史是连续的，路是人一步步走出来的，我们现在追述历史，还原真相，就是要让年轻一代全面了解历史演进的真实过程，从中悟出真谛，以指导当前和未来。对于现在一些人，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以当前的结果为评判标准，对我们那一代人的选择和实践提出质疑甚至全面否定，我着实不敢苟同。关于这一点，我十分赞同本书作者的价值判断：

那一代的“少壮何倜傥”，在当今之世已不大被提起，甚至被历史虚无主义者报以讥嘲。其实，那一代人真诚的初衷，他们由少及壮的奋斗，与当今青年对于正义的追求是如出一辙的。

他们那一代人，弃学问、仕途而不顾，投军报效，奋身救亡，其动机是无可指摘的。无论何党何派，都是爱国青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应为后来的种种荒谬负责的，因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爱国，不应无端被质疑，尤其不该受到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马后炮”式的批评。

我认为，这才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

牟宜之是革命者，也是一位诗人。为其立传，谈他的诗是少不了的。2009

年，我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牟宜之百年诞辰座谈会的发言中，谈到牟宜之是20世纪我国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作豪情冲云霄，爱憎分明。他以诗歌这种艺术形式真实地反映了百年中国，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波谲云诡的时代面貌。他的一些感时伤世的诗句，继承了我国古代文人墨客和士大夫讽喻朝政、刺世嫉邪的傲岸风骨，如写于1958年的《任凭风雨》，写于1960年的《纪念杜少陵七首》，写于1961年的《端午节悼屈原三首》，还有写于1971年的《咏史三首》，其中诸多名句，像“世事纷纭多变幻，人情翻覆似波澜。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与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谭嗣同“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鲁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等佳句一脉相承，令人荡气回肠。然而，带有这种批判色彩的诗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在我国文坛上悄然绝迹。其中原因，关注我国政治文化生活的人皆知肚明，要讲，恐怕也要作专题论述。这里我要说的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可以没有“同步批判”的勇气，可以不为真理、正义呼吁呐喊，也允许随波逐流、与时俯仰，但不论怎样妥协、退让，总要坚持做人的底线，不能为一己之利逢迎谄媚、歌功颂德，甚至落井下石、助纣为虐。回顾一下还不算久远的历史，有多少文人，彼时“写下了一些文字，变成铅字在报刊上登载出来。40年后再回头，要令人为‘道德良心’这四个字而赧颜”（本书作者语）。

牟宜之与上述人不同，用本书作者的话说：“他正是一位由他那个时代锻打出来的斗士，上承古风，下启新潮。古代大儒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风范，他视为终身操守，高标耿介，至最后一息。最难能可贵的是，中年多难之后，他保持了清醒，绝不合流。‘不得志独行其道’，没有仰，也没有俯，活得堂堂正正。”

牟宜之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大量古体诗词，堪称旷世绝响。无论在文学或史学的意义上，其独立思考、同步批判的勇气与预见性，纵是百年之纪，也罕有其匹！正如传记作者所言：“这是一位20世纪70年代的种犴，是良心之子，是我们绵延千载的传统道义化育出来的民族之魂。”

对此，我深表赞同。我的这位具有“国士之风”的兄长，能被当今有识之士所发现、所认同，实乃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好男儿当学牟宜之，因为他确实做到了“生不负时代，死不愧后人！”

2013年2月25日

目录

1 /	序一：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 / 李锐
5 /	序二：为国纾难 为士招魂 / 钟沛璋
1 /	引言：潜听惊雷出笔端
9 /	1 勿忘在莒伏蒿莱
13 /	2 东林家风金石声
18 /	3 青衿学子有所思
24 /	4 少年谈笑赴锋镝
29 /	5 欲从草莽起刀兵
33 /	6 热血怎堪书斋冷
40 /	7 流星即逝亦炫目
45 /	8 永忆履痕入樱花
52 /	9 忍将年华付蹉跎
62 /	10 万里当归重操戈
70 /	11 单骑更向虎山行
76 /	12 翩然一身入荆丛
81 /	13 乱世脱手斩豪雄
92 /	14 英雄相惜若手足
102 /	15 万民阻路为县令
109 /	16 即从虎穴下渝州
118 /	17 雾都啖饮亦豪侠

126 /
131 /
140 /
147 /
155 /
169 /
180 /
190 /
199 /
215 /
224 /
236 /
247 /
255 /
265 /
280 /
292 /
306 /
316 /
327 /
343 /
366 /
386 /
407 /

18 遂向关陕遇旧识
19 夜惊马蹄过太行
20 讨逆初识野战图
21 辕门纶巾四奇侠
22 沂蒙征战几生死
23 白玉何忍青蝇玷
24 情定沙场系灵犀
25 舌辩可抵万人敌
26 血溅白山闻战声
27 初走麦城终不悔
28 为官须有织妇心
29 中年最痛爱子丧
30 依旧任侠作京官
31 独有慧眼识鬼蜮
32 风波乍涌等闲看
33 英雄翻作槛中囚
34 岂有盛世忧饥肠
35 更作流民向边荒
36 野老无计驱顽童
37 万古穷荒有芝兰
38 弹铗只为黎民怨
39 万树蝉吟有恨声
40 凤鸣九皋天亦悲

尾声：今人何以慰国土

引言：潜听惊雷出笔端

现在我将提笔书写的这部书，似是生命中一枝斜出的枝干，原本未有，却又命定似的出现。发蕊吐芽，虬结成冠，必欲酣畅淋漓而罢之。

我僻居南疆蛮荒之地久矣，很少北上。但是，自2011年起，我两次北上，跋涉千里，遥至生平所未涉足之北疆齐齐哈尔，重见24年未亲历之鹅毛大雪。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家族，为了两代英雄。

山东日照市西南一隅的牟家小庄，是这株英雄之树的根系所在；白山黑水，则是他们生命的枝蔓外延的土地。我两赴齐鲁，进而纵贯东北，都是为了追寻历史所湮没的邈远足迹。

我想要追踪的这个人——牟宜之，曾于数十年间湮没无闻，除了亲朋，罕有人知。

但是，玉在璞中，终生光华；剑没深渊，终将跃起。

从2009年1月起，他的名字，倏忽间在知识界某一范围内不胫而走。他的遗诗，甫一出版上市，竟一销而空，旋又加印。

牟宜之（1909—1975），是一位难以给他的身份准确命名的传奇人物，一位从不辜负时代而时代却辜负了他的慷慨之士。他少年有为，发愤自砺；青年报国，投笔从戎；中年蹭蹬，沉郁多艰；终至在漫天的尘埃中不甘心地倒下，死不瞑目！

也许，他就像一位生错了时代的古之名士？

不，他正是一位由他那个时代锻打出来的斗士，上承古风，下启新潮。古代大儒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风范，他视为终身操守准则，高标耿介，至最后一息。最难能可贵的是，中年多难之后，他保持了清醒，绝不合流。可谓“不得志独行其道”，没有仰，也没有俯，他活得堂堂正正。如他所说：“我是绝对拥护真理的人，我是纯真的人，我能为真理牺牲一切，这是

有事实表现的。”

这，才是百年之后亦令子孙无愧的“大丈夫”。

像牟宜之这种人，其实可以没有墓园、没有纪念故居、没有记功碑，他之金石灼灼的言行事迹，就是一座至高至伟的非人工的纪念碑。

牟宜之生于1909年，是一位典型的“20世纪知识分子”。这一代知识分子，生于末世运偏消，横跨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几乎全过程，是命定的悲剧一代。很可惜，当他在66岁不幸忧愤而终时，恰是大雾弥天的1975年，离曙光初露仅有年余。

这一点，若他地下有知，必长歌当哭，万世心也难平！

在20世纪，牟宜之为国运所催迫，百年风雨中，亦文亦武，或官或民，以至很难只用一种身份来界定他。李锐先生在为《牟宜之诗》所作短序中，仅称他为“诗人”^①，我觉得再恰当不过。这不仅是因为他在20岁之后至临终，留存于世二百余首意蕴丰富的旧体诗，更重要的是，他或革命、或从军、或为政、或被谪，都不脱诗人本色，“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②。

他的脱俗、超拔、傲岸，正是诗人之气质。

作为肉身的人，他虽被时代浊流所摧折，但作为精神的人，他是不可被摧折的，永远昂起头颅，以身为薪，为异常稀薄的文明之脉添一抹微光，燃亮一颗星辰。

做人至此，足矣！

现实中的牟宜之，结局是苍凉的，庙堂不能容他，江湖居然也归不得，在距故乡咫尺之遥的地方延宕着，成为天地均不容留的人。他是恶人么？他是叛贼么？不是。恶人或叛贼服输了，还能有一个体面的进退居处。然而，这个忠勇之士，这个为中华复兴而捐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儿子生命的人，却一度“死无葬身之地”！历史何由对他如此严酷？

天意从来高难问，然而牟宜之在临死时已经看清楚了。他的旧体诗，如匕首般锋利，勘破世事，谈笑古今——谁没有日薄西山的一天？他只坚信忠奸不两立，后世有定评。

他活着时，愿为生民肝脑涂地。他死后，必使佞人宵小无地自容。

^①李锐：《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牟宜之诗》序第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牟宜之：《少年行》，《牟宜之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页。